

办好高校专业图书资料室的几点体会

吕 慧 芳

(复旦大学数学系资料室)

我们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是在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到了一九六六年,已具相当规模,成为数学书刊比较齐全,具有一定特色的专业图书资料室。我室现有藏书六万册(包括期刊合订本)绝大部分是外文书刊。如1826年创刊的国际上第一种数学杂志《Crelle杂志》,从创刊至今,完整无缺。目前每年订购国内外有关专业期刊四百种以上。全室共有工作人员五名,以青年为主。近几年来,我们除了做好日常的书刊订购、出纳、流通等管理工作外,还陆续开展了一些数学情报资料工作,如参加了汉语主题词表数学类的部分编制工作和试标引工作,翻译数学文献,介绍国际数学会议动态,并组织建立了教师、科研人员、资料人员相结合的情报小组,编辑出版了《国外数学资料题录索引》、《数学译文集》等,为教学科研作出了一些成绩,受到了上级领导、教师、研究人员和同行的表扬,也得到了不少国外数学家的赞赏。一九七九年我室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

下面,汇报一下我们在办好专业图书资料室的几点体会。

一、追踪科学,提高资料情报工作的服务质量

提起图书资料室,人们往往立即会想到买书、管书、借书。当然,书刊的订阅、流通,这对于图书资料室说来,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图

书、情报工作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果仅仅满足于图书交流这一点,就远远不能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了。

我校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深切地说:“我希望数学资料情报工作,要把眼睛牢牢钉住国际上最新进展,这样才能促使数学科学攀登世界高峰”。科学院学部委员、数学家夏道行教授说:“五十年代我有个小本本,经常在上面记一点文献目录,就可以满足我的需要了;而现在,我的小本本已不够用了”。他又说:“你们资料室十天不工作,那我们就得被迫停止研究工作,因为我们研究的都是发展非常迅速的领域”。他们的话深刻地阐明了资料情报工作对于教学科研的重要性,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在工作中,也确实感到,图书资料室的工作只有追踪科学,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目前自然科学各学科朝着既高度综合又高度细分的方向发展,研究方式也由科学家个人自由研究,转向有组织的、协作的、跨学科的研究。与此相应,科技文献的数量急剧增长,而文献分布又异常分散。就以数学为例,美国的《数学评论》(Math. Rev.) 1940年创刊时,仅把数学分成11个类,一年评论2224篇文献,而到了1979年,就发展为61个类,一年评论的文献达52812篇。三十年来,数学分支学科数目和评论文献的篇数分别增长了近6倍和24倍。在这种情况下,图书资料员不搞一些科学研究,能行吗?在实际工作

中遇到的二件事,对我们的触动和启发很大。一件是1977年底我系函数论教研组两位教师合写了一篇关于单叶函数系数估计问题的论文,正要在学报上发表时,却发现1976年国外的一本杂志上已发表了别人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同样的结果。这样,他们就白白浪费了三个月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另一件十分巧合的事是,同是这位教师,78年开始参加情报小组后,在《美国数学通报》(Bull. AMS.)上看到了一篇《单叶函数系数问题》的述评性文章。文章回顾了1964年以来这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十大问题。这十个问题中无论那一个,如果得到解决,都将具有世界水平。他及时地把这篇译文提交给同年召开的全国函数论会议作为资料,以供参考。这两件事的对比,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积极主动地做好资料情报服务工作,就能为教师、科研人员赢得宝贵的时间,有利于早出成果,多出人才。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增强了我们搞好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我们把对四化事业的满腔热情,溶化到日常平凡的情报服务工作中去,积极主动地为教学科研工作“嫁衣裳”。

为了使我们的工作能适应教师、科研人员的需要,近几年来,我们从具体条件出发,开展了以下几项研究工作:

(1)参加了汉语主题词表数学类部分编制工作。资料室部分同志在图书情报界同志的指导下,在教师、科研人员共同参与下,与其它五个兄弟单位一起,经过三年的努力,圆满完成了编表的工作。随着词表的正式出版,今年起我们又特地成立了一个《主题词试标引科研小组》,准备花四、五年时间,为数学类词表的标准化,开展一些工作。

(2)进行数学期刊发展情况的研究,帮助教师了解国际数学期刊的概貌和特点,以便更好地利用期刊这一重要的情报来源。在此项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还撰写了《国外

数学期刊发展的几个特点》的学术论文。此文在今年上海市数学年会上宣读,并在广西大学、杭州大学向数学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介绍,反映较好。数学家夏道行教授也认为该文具有一定的水平。

(3)研究确定核心期刊。为了提高收藏书刊的质量和经济效益,我们根据《索引》编制及日常出纳工作中积累的数据,对照国际上鉴定核心期刊的理论和方法,并经与专家们反复商讨,研究提出了数学十三个分支的一百十九种核心期刊的品种,提交有关专家们使用、修改和补充。我们准备再经过二、三次反复,提出一份更加符合实际的数学核心期刊名单。

(4)向师生普及文献常识。在我们工作中经常遇到许多教师、研究生、进修教师由于对图书分类、资料类型不熟悉而白费许多功夫查找文献的情况。为此,近年来我们坚持主动向他们介绍数学图书分类、各类文献特点、规律等基本的文献知识,以帮助他们熟悉文献,利用文献。在此基础上,我们准备从今年下半年起,开设较为系统的专业文献课。

(5)此外还探讨情报资料工作中共同关心的有关问题,如上海市的资料布局、基础学科情报工作的问题,高等学校专业情报工作的方法等,并撰写学术论文。

在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我们还立足于当前,使当前的工作与长远的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不断积累工作经验。如订购工作,特别是原版图书的订购,既要保证图书的质量,又要注意重要丛书的配套,防止重要图书的漏订及重复,积极扩大消息来源,搞好主动订购。在期刊工作中主要是防漏(重要期刊的漏订),防缺(缺期)及努力实现资料系统化(如解决好成套期刊的缺期、主要国家的重要期刊的残缺不全问题,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数学应用,数学与力学等方面的协调问题,学术性与消息性期刊的比例

问题等等)。这样就使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可以检查的标准,能在一个比较科学的轨道上来进行。从而使我们的工作长期来能保持较高的效率和质量。

又如,在出纳工作中,我们基本上能做到以下五点:首先,对教师提出所需要的资料,可以回答我室有无收藏,或者告诉什么地方有收藏;其次,当教师发现他需要的资料被人借走时,我们就能查出此份资料的去向;第三,不轻易的、简单的用“没有”或“已借出”把教师打发掉,而是根据需要的情况,积极设法解决;第四,主动解决教师提出的疑难问题,如记错的书名,或者只知道文献的大致题目,要寻找原文或原文刊登的杂志……等等;第五,经常主动地向教师推荐与他们教学科研有关的书刊,并积极主动的做好新书介绍工作,以供他们参考、借鉴,充分发挥书刊的作用,提高资料利用率。

二、甘当配角,建设一支有事业心的骨干队伍

我们资料室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和资料室全室同志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分不开的。尽管我们只有五个人,且人员的文化水平不高,业务能力不强,但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一段工作的实践,都深浅不同的认识到资料工作与教学科研的血肉联系,决心以实际行动,为教学科研工作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我是1956年初加入资料员的队伍的。二十多年来,自己对资料员的工作,也经历了不断提高认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的过程。刚开始,我既不热爱这个工作,也不懂得如何做好工作,只凭五十年代所受的教育,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支持我开始走向生活。在党的教育和老同志的帮助下,也经过不少思想上的曲折和反复,通过实际工作的教育,使我逐渐感受到了自己的工作与教学

科研的血肉联系,并把它当作一项事业去追求。譬如,文革前,为了补全资料,我利用假期用打字机整期整期的把资料借来,打好补上。为了积累资料,我主动把教师的业务档案工作初步建立起来。粉碎“四人帮”前,我就参加了“748工程”的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把一大批珍贵的国外期刊补齐,积极地组织情报小组搞翻译,出《索引》,组织协作组,搞主题词标引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都不是领导下达的任务,而是自己感到应该主动提出并承担的。用我系一位副教授的话来讲,他说:“对她(指我)用不着去叫她做什么,她自己会干的”。有时有的年青同志也不无抱怨地说:“吕老师最爱出花样,一会搞这个,一会又要搞那个”。说实在的,我确实是要求自己这样去做的。这几年中,在全室同志的努力下,我们不硬是挤进了那么一些工作,开辟了一个与过去工作虽有联系、却完全不同的新的工作领域。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自觉性,不能不归之于对事业的追求和受责任感的驱使。

要搞好图书资料室,光有责任感还是不行,重要的是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掌握本领,提高服务技术。近几年来,我一边搞科研,一边学习外语与情报学的基础知识。正由于这样,才使我从一个中学生慢慢的成长为具有一定的图书情报基础和专业知识的专门人员,也正由于这样,才使我在上海市情报学会举办的讲座、在给上海师大图书馆学系学生作的讲座、以及为复旦分校图书馆学系学生开设的《情报学概论》课中,得到大家比较一致的肯定。我在坚持参加资料室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还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工作经验,撰写学术论文。我认为,这也是提高业务水平的一个好办法。总之,为了做好今天和明天的工作,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我常用“笨鸟先飞”的话来勉励自己,要求自己比别的同志多学点,早动

手。一句话多下苦功夫，，以适应工作的要求，力求把工作做好些。其余四位同志，克服了许多困难，坚持自学或参加夜大学的学习。目前，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有关图书资料的业务知识，和一定的数学知识，大部分同志外语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有的同志还在积极争取考翻译职称呢。

三、搞好协作，主动取得领导、群众的支持

我们认识到，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要进一步搞好资料室工作，必须深入到学科领域中去。但要深入到学科领域中去进行资料服务工作，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做好的。我们五个同志中，只有两人学过数学系的基础课，另两人是文革中毕业的中学生，还有一人是学外语的。总的来说，数学业务底子差，从外语来讲水平也不高，因此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专业人员的积极性。

我们系、所的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力量是雄厚的，并且有支持和帮助资料室工作的好作风。我们主动向领导提出组成教师、科研人员为主，与资料人员相结合的科技情报小组，开展数学、科学情报工作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系、所领导的积极支持，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组织起了一个有不同专业和不同研究方向的一名教授、四名副教授、十三名讲师和二名资料人员组成的情报小组。这些教师和科研人员都是业务基础扎实，学术上有一定造诣，外语语种较广，同时又是支持图书资料工作的热心人。

情报小组每两周活动一次，事先，由我们资料人员准备好两周来的最新专业外文资料，由兼职情报员分别对有关文献进行筛选和分析研究，然后以资料人员为主与教师一起进行主题词标引。在此基础上，由资料室纂编，并每月出版一期《国外数学资料题录索引》，分发给系、所每一位教师和科研人员，还与全国有关的兄弟单位交流，以供参

考。如果发现反映国际数学界新动态的述评文章时，就分头翻译，不定期出版《数学译文集》，以传递情报。

我们编辑出版的《索引》，到目前已出版了42期，不仅受到我系、所教师和科技人员的欢迎，而且受到了许多兄弟单位的赞扬。参加情报小组的教师在迅速获取有用情报方面受益很大，对教学科研有很大帮助。他们的积极性也不断提高。他们在参加一些全国有关专业会议后，共同的反映是，他们都是自己领域内的“消息”灵通人士，因为他们对本领域中的重要文献十分熟悉，同时，从事情报资料工作对他们指导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讨论班有很大的帮助。全国许多兄弟单位的教师、研究人员利用我们的《索引》也获得了许多有用的情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一位研究人员来信说：“我在研究复样条函数时，正苦于缺乏资料，根据《索引》提供的情报，我找到了匈牙利《Acta Math》杂志上的文献，帮助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没有《索引》，我绝不会发现在匈牙利杂志上的急需文章的。”

有一次，我们情报小组活动时，一位研究人员发现美国《物理快报》(phys Letters)上有一篇关于引力瞬子解的文章。感到文章提供了一个新思想，即把过去在规范场中讨论的瞬子解问题，引向了引力场，并将引力场与规范场结合起来讨论。这位情报人员迅速向谷超豪教授作了汇报，谷教授发现，尽管这篇文章比较粗糙，但是他的思想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应当对此开展深入的研究。后来杨振宁博士来华时，对此也感兴趣，于是两位科学家合作研究，在1978年就取得较好的结果（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两篇论文），1979年2月，谷教授赴美后继续深入此项研究工作，结果得出了推广的相应不变量之间的关系，写出了新论文。此项研究结果，引起了国内外数学家、物理学家的重视。美国国家技术情报服务局最近来信说，

已把谷教授的论文作为质量有保证的论文样品进行编目,并已存入该局的计算机中,以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查考。

情报资料工作对教学工作也给予积极的促进。今年,我系函数论组的一位副教授编著了我系历史上第一份《多复变函数论》教材,附了一大批参考文献目录,其中最近三年的参考文献共155篇是完全从我室《索引》中摘取的。据统计,三年来(截至1981年4月)《索引》共摘选了多复变方面的文献195篇,而编入作为重要参考文献的就达155篇,利用率几乎达80%,这样的利用率我们认为是很高的。

资料室工作能得到顺利开展,除了三结合的优越性之外,还与领导的大力支持分不开。校长苏步青身体力行,重视资料室的建设。他与已故数学家陈建功教授一起,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冒着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保存下来的一批珍贵书刊,为我们资料室奠定了基础。解放后他更是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资料室的建设,即使在四害横行,他本人受迫害时,还仍然偷偷地把资料送给资料室。学校党委负责人早从六十年代就提出希望把我室建设成为数学研究服务的数学资料中心。粉碎“四人帮”后,校领导都亲自到资料室检查工作,找资料人员谈心,表扬我们的工作。数学系系主任和总支更是亲自过问资料室的建设,不仅帮助制定发展规划,而且及时解决我们的一些困难,如增派工作人员,扩充库房,添置设备等等。系主任谷超豪教授本人,在赴美繁忙的研究工作中,为资料室补购了书刊,这中间不知花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近两年,由于学校图书经费紧张,为了保证重要期刊的订购,系领导积极想办法与系里各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商量,在大家的支持下,这两年光自筹的图书经费每年就达5—6万元。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切实的支持,资料室建设就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取得实际的效

果。甚至会寸步难行。

搞好图书资料工作,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要建立较为广泛的国际联系和资料交换关系。

自1956年起,在学校的支持下,我室主动地开始了国际间的资料交换工作,当时主要的对象是日本。到1966年,逐步发展到与三个国家近十个学校和团体建立了联系。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积极利用外宾来访,我系教师出国等机会及资料室自己出面主动与国外有关学术团体和机构联系。目前我们已与十个国家,约四十个学术团体和机构建立了正常的资料交换关系。通过国际合作和交流,不仅为教师和科研人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并且节约了大量外汇。

四、立足改革,加强图书资料工作的统一领导

我们图书资料室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问题仍然不少。这当中有我们工作人员的主观原因,也有图书资料工作的实际问题,并且具有普遍性。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提出,以求引起领导的重视。

1、体制问题

长期以来,对高校是单独设情报机构,还是实行图书情报资料一体化的问题,争论已久。从我国现状出发,我个人认为,为提高书刊利用率,更好发挥图书资料工作对教学科研的促进作用,在高校图书馆中加强(或增加)情报工作的职能是可取的。希望这次会议对这个急迫问题的解决能有所推动。

2、队伍建设问题

图书情报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直接联系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用具有中专以上水平,经过专业训练的各种专业人员来逐步更替目前还在工作着的,但未达到中专以上水平的普通工作人员,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我国国情,采取专业学校培养和在职干部轮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加

速改变图书馆队伍构成情况的有效方法,而重点应放在现有人员的轮训上。希望对此能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但也有一定强制性的办法来。在3—5年内把现有的尚未达到上述要求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轮训一遍。对少数文化水平实在太低的同志,应适当另外安排。

与此同时,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做好图书馆人员的职称评定工作,落实国务院文件,是稳定现有队伍的有力措施。这次文件对低级图书馆员注意了服务质量的问题,是很好。但目前高校在图书资料人员定职称问题上普遍存在着只看文凭,不看实际工作能力,贬低服务工作,也即贬低图书资料人员为教学科研作“嫁衣裳”的高尚品德的错误思想,生搬硬套教师、科研人员定职的条条框框,特别是在少数领导同志中,也抱有此种看法。说什么“选劳动模范可以举双手赞成,定职称是另一回事。”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有片面性,甚至是有害的。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应是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或尖兵,政治与业务是统一的,而不应是矛盾的。为了图书馆事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鼓励政策,才能使现有队伍的中坚分子更积极更坚定,使动摇的同志稳定下来,促使一部分想混日子的人猛醒过来,否则长期只打雷不下雨,是无法使图书馆事业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的,也不可能趁高校调整之机,让一些原来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同志转到图书情报工作上来,以加速改变现有的队伍结构。

8、努力加强专业资料室的建设,搞好专业情报工作

利用现有的专业资料室,借重科研人员、教师的力量,实行与资料人员相结合的组织形式,进行专业情报工作。根据我们的经验,是开展专业情报工作的一条捷径,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否有普遍意义,有待于讨论。为了巩固和发展,对兼职情报员进行资料情报工作的工作量等问题,需要认真讨

论,规定一些措施。

4、要保证重点单位一定的物质条件

由于我国物质基础较差,加之一些人的原因,使图书馆建设出现了反复。仅以图书经费为例,前三年,似乎图书经费用不完,最近二年,外汇及人民币均有较大的压缩。这对图书馆工作十分有害,因为书刊资料需要积累,特别要形成收藏特色,不是一年、二年,甚至要一代、二代人才能做到的。另外经费太多了滥买书刊的情况也是有的,但绝大多数有经验的同志都不会干这种蠢事。反过来,必需的书刊购买不能正常进行,却真是要命的事!“四人帮”破坏图书资料方面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的,也不是化些钱就可以消除的。因此向领导呼吁,国家经济有困难,但千万不要把图书经费也砍一刀。也不要无目标地平均摊派,而应采取措施,保证重点单位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就以我室为例,80年的外汇在79年10—12月就用完了,而现在又在用82年的外汇了,一些必要的书籍都不能订,真使人又急又难过,请领导千万要体谅图书工作的难处,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

5、化大力气抓好图书馆基础工作的整顿和规范化

用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缩微技术、通讯网络等手段来逐步武装以手工的、分散的方式为主的图书馆工作,是发展趋势。但根据我国国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认为也只能以人的手工劳动为主。而且不管采用什么先进手段,第一位的仍然是图书馆的基础工作——搜集、整理、加工、流通、服务等工作,而前段时间由于某种误解而散播的所谓“只要有了计算机,图书馆工作的一切矛盾就迎刃而解”的看法,我认为是片面的,它特别对图书馆的整顿不利。对此我们也有过一个认识“过程”。78年我室也进行过部分西文文献的计算机检索试验工作,并获得初步结果,但实践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

适应四化需要 加强图书馆学教育

彭斐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九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教育部和文化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学教育座谈会,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九所设有图书馆学系或专业的高等学校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如何加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交流了经验,并就某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改进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迄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但是,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缓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全国仅有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设有图书馆学系,二十八年来总共培养了三千人,包括本科生和函授生。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图书馆学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十七所高等院校先后设立了图书馆学系、专业或专修班,在校学

到,没有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即使有了计算机也无济于事。据接触中了解,一些单位连图书分类、排卡、排架等工作都未走上正规,但以极大的力气进行计算机检索的试验,真使人不能理解。因此我认为,首先要花大力气认真抓好图书馆基础工作的整顿,使订购、编目、管理、流通等工作环节都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工作制度。把内部的协作建立在科学的管理基础上,并力求规范化,那就为将来实现计算机检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件事是否可以有个时间指标,即花上3年的时间抓好图书馆内部的整顿。

6、健全图书情报资料网络,达到“资源”共享

近些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事业都以现代化和网络化为中心,开展了积极的、有目的的组织协调工作,甚至超出了本国的范围而建立起国际间的合作网,以达“资源”共享的目的。我国虽然也早在1958年就建立了全国第一中心和第二中心图书馆网络,但除了松散的联系外,没有什么进展,相比之下,我们这方面的工作使人失望。由

于没有做好有意识的组织协调工作,使我们在书刊购买方面,要末复本太多,要末有些方面的书刊长期来在全国或一些大地区都是空白,致使资料不全,影响使用。也就是说在资料的布局方面,缺少长期的打算,也没有有意识地来建设,无人问津。就拿上海教学资料来讲吧,我们一直呼吁上海第二中心图书馆,明确把数学资料点设在我室,组织好协调订购,并给我们创造一定的条件,让我们更好的为全市,进而为全国数学界及一切要利用数学资料的同志服务。但现在是上海图书馆、上海情报所及一些大专院校等单位都各自为政,分散订购;彼此重复不少,空白点也很多。如此下去,我感到是不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的,殷切期望会议对此类问题的解决能有个积极的推动。

各位领导,各位前辈们,由于二十五年来一直在一个系资料室搞具体工作,因此见识少,加之业务底子薄,所以提出一些看法都离不开我所处的特定环境,肯定有许多不到、不当之处,请各位多多指教。